

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有人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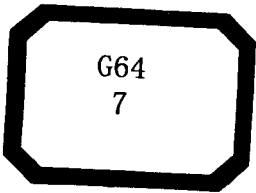
大学何贵乎

陈平原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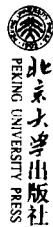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有人才。



陈平原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何为/陈平原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
ISBN 7-301-10718-8

I. 大… II. 陈… III. 大学—研究 IV. G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6055 号

书 名: 大学何为

著作责任者: 陈平原 著

策 划 编 辑: 赵 婕

责 任 编 辑: 周志刚

标 准 书 号: ISBN 7-301-10718-8/G · 1873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子 信 箱: zyl@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6

排 版 者: 北京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58745033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0.5 印张 247 千字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自序

将近年所撰关于大学的文章结集成书,总该有个理由。比如,跟本人已刊诸书相比,是否有所推进?相对于学界同仁的著述,又有哪些特点?即便没能在理论上独树一帜,起码也得在学术思路或写作策略上显示自家面目。记得小时候过年,最常见的对联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可这不能成为爆竹声中编排新书的充足理由。还是略为回顾各文的写作经过,也算是给自家著述添加若干略带广告性质的注脚。

作家查建英采访时,曾追问我在2003年北大改革论争中的立场:“那场争论当中,人文学者是反对张维迎改革方案的主力,而社科学家,特别是经济学家们,则是支持的主力。我觉得你的态度在人文学者里比较少见,你始终保持一个温和的调子来讨论问题,你赞成的似乎是一种‘保守疗法’,一种稳健的逐步的改革。”^①这是一个很敏锐的观察。确实如此,我谈北大改革四文,虽然也入各种集子^②,但不是这场论争的代表性论述。因为,针对性不强,基本上是自说自话;作为论辩文章读,不过瘾。

为什么?并非不晓得报章文体倾向于“语不惊人死不休”,只因我更欣赏胡适创办《独立评论》时所说的,作为专家而在公共媒

① 参见本书《我的“八十年代”》一文。

② 如沈颖主编《燕园变法》,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9月;博雅主编《北大激进变革》,华夏出版社,2003年9月;钱理群、高远东编《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甘阳、李猛编《中国大学改革之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

体上发言,要说负责任的话,既不屈从于权威,也不屈从于舆论。大学改革,别人说好说坏,都可以斩钉截铁,我却深知兹事体大,休想快刀斩乱麻,毕其功于一役。历史证明,那样做,不但不现实,而且效果不好。

相对于论战诸君,我之立论稍微不同,很大原因在于,我对百年中国大学(尤其是北大)有过若干研究。已经刊行的《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北大精神及其他》《中国大学十讲》等^①,不敢说有多精彩,但起码让我对中国大学的历史与现状有较多的了解。理解大学问题的复杂性,理解改革的代价,也理解各种冠冕堂皇的口号背后,很可能隐含着利益争夺甚至各种卑污的权谋。因此,与其说我在参加论战,不如说我在延续已有的叩问与思考——叩问大学的历史与现实,思考大学的理念与实践。

正如德里达说的,“大学存在于它企图思考的世界之中”,要想承担起历史责任,组织一种创造性的抵抗——“抵抗一切(政治、司法、经济等)(对大学)的重占企图,抵抗一切其他形式的主权形态”^②,其实是十分艰难的。尤其在当代中国,谈论大学改革,涉及理想与现实、中国与西方、制度与精神、个人与国家等,远不只是制订若干操作手册那么简单。

在《大学三问》中,我特别强调:

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
“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

而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中,我又认定:

^① 《北大旧事》,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老北大的故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中国大学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② 参见杜小真、张宁主编《德里达中国讲演集》第13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

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百年北大,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流血流泪,走弯路,吃苦头,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你可以批评她的学术成就有限,但其深深介入历史进程,这一点不应该被嘲笑。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北大改造成为在西方学界广受好评、拥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进程无关,那绝对不值得庆贺。

如此强调大学植根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情境,无法简单复制,故全书以《大学之道》起兴,而不以关于北大改革诸文开篇。在我看来,后者只是波澜壮阔的中国大学改革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好戏——或者烂戏——还在后头呢。

“中国经验”,尤其是百年中国大学史,是我理解“大学之道”的关键。我当然明白,今日中国的大学制度,主要是“旁采泰西”而不是“上法三代”的结果。因此,在思考及论述中,除了孔夫子以降的历史经验,更倚重西贤有关论述。比如,关注“大学的理想”^①,也探究“大学的功用”^②;思考“学术责任”^③;也努力“走出象牙塔”^④;进入“美国校园文化”^⑤,也面向“21 世纪的大学”^⑥。教育学家的著述固

① 参见约翰·亨利·纽曼著、徐辉等译《大学的理想》,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② 参见 Clark Kerr 著、陈学飞等译《大学的功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

③ 参见唐纳德·肯尼迪著、阎凤桥等译《学术责任》,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

④ 参见德里克·博克著、徐小洲等译《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⑤ 参见亨利·罗索夫斯基著、谢宗仙等译《美国校园文化——学生·教授·管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⑥ 参见詹姆斯·杜德斯达著、刘彤等译《21 世纪的大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然精彩，以下三段关于大学的评说，同样或者更让我感动：

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每一任务借助参与其他任务，而变得更有意义和更加清晰。^①

为了实现人的潜能，为了克服我们政体不易于理解各种重要政体形式的倾向，大学必须站出来帮助孤立无援的理性。大学是容纳探索 and 思想开放的地方，它鼓励人们不是功利性地而是为了理性而利用理性，它提供一种气氛使哲学怀疑不致被道德风尚和占上风的势力吓倒，它保存伟大的行为、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思想，以使对潮流的挑战和置疑能够得到滋养。^②

大学，与所有类型的研究机构不同，它原则上（当然实际上不完全）是真理、人的本质、人类、人的形态的历史等等问题应该独立、无条件被提出的地方，即应该无条件反抗和提出不同意见的地方。^③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布鲁姆（Allan Bloom, 1930—1992）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这三位大学者，政治立场以及学术面貌迥异，或存在主义，或保守主义，或解构主义；但作为哲学家或政治学家，他们都聚焦大学在急速变化着的当代世界中的地位与作用，都将人文学作为大学的核心，关注其跌宕起伏的命运，这是我所感兴趣的。或许，正因为他们不是教育专

① 雅斯贝尔斯著、邹进译《什么是教育》第150页，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

② 布鲁姆著、缪青等译《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第26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③ 杜小真、张宁主编《德里达中国讲演集》第6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

家,不太考虑技术层面的教育组织、教育管理、教育经济等,而集中精力在文化、精神、价值层面上思考大学问题,这样一来,反而能在“教育名著”视野之外,开辟广阔的思考及论述空间。而这也正是我切入“大学”的角度——在我看来,中国的大学改革,需要教育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以及一切对教育感兴趣的读书人的共同参与。

谈论中国大学,可以是专业论文,也可以是专题演讲,还可以是随笔、短论、答问等。不完全是为本书之体例驳杂辩解,假如希望兼及历史与现实,确实不一定非高头讲章不可。或长枪,或短棒,或匕首,或弹弓,只要有效,不妨十八般武艺一起上。我之不薄“演讲”,是因为特别看重公众对于“大学”这一社会组织及文化传统的自我反省能力。书中好些章节,是作者应邀在北大、清华、华师大、首都师大等为大学生、研究生所做的演讲稿。《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的前四节是在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大学精神、大学理念与校园文化”研讨会(成都)上的专题演讲,后两节则是在陕西电视台“开坛”节目中与各民办大学校长的对话。《大学之道——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教育》以及《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虽是专业论文,却也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和日本京都大学组织的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并获广泛好评。至于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上所做的专题演讲“中国大学百年”^①,因主要观点已见《中国大学十讲》中的同名论文,这次不再收录。

一般说来,“演讲”以及“答问”,远不如“论文”专深,好处是体现一时代的文化氛围。假如你的拟想读者不是教育专家,而是关注中国大学命运的读书人,那么,采用这种现场感很强的“对话”姿态(包括保留听众的提问),未尝不是“讨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

① 文稿刊《中国大学教学》2005年10期。

种教育类型、一种论述策略、一种影响极为深远的独特文体,“对话”是人类探索真理以及认识自我的有效途径。不满足于传递或接受专业知识,更希望学习思考,追求真理,参悟人生,那么,永无止境的“叩问”与“对话”,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这么说,类似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所自嘲的“戏台里喝彩”。其实,将论文与随感、演讲与答问、历史与现实、宏大叙事与私人记忆等掺和在一起,造成一种明显的“对话”状态,在我,不是有意为之,而是歪打正着。本书之“未完善”,正好对应着中国大学改革的“进行时”——正因为中国大学仍“在路上”,既非十全十美,也不是朽木不可雕,这才值得你我去追踪,去思考,去参与。

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学术思路”比“著述文体”更值得重视,那就是:从历史记忆、文化阐释、精神构建以及社会实践等层面,思考“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有什么、还能做些什么。

丙戌正月初六,是日阳光普照,最低气温零下
十度,浓郁的水仙花香中,编定全书并撰序

目 录

自序	(1)
----------	-----

大 学 记 忆

大学之道

——传统书院与 20 世纪中国高等教育	(3)
---------------------------	-----

大师的意义以及弟子的位置

——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	(21)
------------------------	------

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	(51)
---------------------	------

设议院与开学堂	(73)
---------------	------

从新教育到新文学	(84)
----------------	------

书法的北大	(92)
-------------	------

北大边缘人	(101)
-------------	-------

大 学 理 念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	(109)
------------------	-------

大学排名、大学精神与大学故事	(135)
----------------------	-------

大学精神与大学的功用

——答《人民日报》记者徐怀谦问	(159)
-----------------------	-------

大学三问	(171)
------------	-------

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

——我的大学观	(187)
---------------	-------

我看北大百年变革	(192)
附录 在《读书》杂志关于大学改革座谈会上的发言	(204)
为大学校长“正名”	(207)
我看“大学生就业难”	(213)

我的大学

我的“八十年代”	
——答旅美作家查建英问	(221)
“好读书”与“求甚解”	
——我的“读博”经历	(254)
博士论文只是一张入场券	
——答《中华读书报》记者问	(261)
学院的“内”与“外”	
——答《读书时报》记者问	(270)
学者与传媒	
——答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许燕问	(282)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	(306)

大学记忆



大学之道

——传统书院与 20 世纪中国高等教育

20 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潮流中,“西化”最为彻底的,当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今日中国之大学,其价值趋向与基本路径,乃舶来品的 University,而非古已有之的太学。因而,尽管教育史家喜欢谈论“四千年的中国大学教育”,古今中外“大学”之巨大差异,依然使得二者很难同日而语。这其实正是本世纪中国大学教育的困境所在:成功地移植了西洋的教育制度,却谈不上很好地继承中国人古老的“大学之道”。

积弊已久的传统中国教育,其“无裨实用”,在晚清,成为传播福音的传教士和寻求富强的士大夫集中攻击的靶子。时人之“破旧”,主要攻击的是科举取士;至于各式书院之利弊得失,反而无暇细究。只是在新学制已经创立的二三十年代,有过研究书院的小小热潮。此后,又是长期的沉寂,直到 80 年代方才有复兴的迹象。^① 可即便如此,今日中国的大学,依旧是欧美模式的一统天下。

^① 《中国史学论文索引》(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下编收录二三十年代关于书院研究的论文 50 篇,作者有胡适、柳诒徵、盛郎西、谢国桢、陈东原、梁瓯第、班书阁、吴景贤、王兰荫等。此期间出版的专著有周传儒的《书院制度考》(1929)、盛郎西的《中国书院制度》(1934)和刘伯骥的《广东书院制度沿革》(1939)。八九十年代出版的书院研究著作有:陈元晖等《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1981)、章柳泉《中国书院史话》(1982)、张正藩《中国书院制度考略》(1985)、杨慎初等《岳麓书院史略》(1986)、李才栋《白鹿洞书院史略》(1989)、朱汉民《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1991)、丁钢《书院与中国文化》(1992)、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1993)、李国钧等《中国书院史》(1994)、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1995)、陈谷嘉等《中国书院制度研究》(1997)。

这就难怪 Ruth Hayhoe 在描述百年中国大学教育历程时,用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断语:“欧洲大学的凯旋。”^①

但这不等于说,本世纪中国的教育家,不曾有过借鉴书院教学、发扬传统教育精神的愿望与努力。本文借勾稽康有为、章太炎、唐文治等十位身兼教育家的学问家或政治家融会中西教育的尝试,探讨精神渗透与制度建设之间的巨大张力,力图为二十一世纪中国大学的健康成长提供也许是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

一、书院之远逝

废科举,开学堂,育人才——这几乎是晚清志士的共同思路。分歧在于具体策略,尤其是如何看待源远流长的书院。“时局多艰,需材尤急”,无法生产坚船利炮的书院,其教学宗旨及培养方案,非改不可。于是,出现了三种颇有差异的选择:

- 1) 整顿书院,增加西学课程(胡聘之等);
- 2) 保留书院,另外创设讲求实学的新式书院或学堂(廖寿丰等);
- 3) 请皇上发布诏书,“将公私现有之书院、义学、社学、学塾,皆改为兼习中西之学校”(康有为等)。^②

取消书院,以便集中人力财力,发展新教育,这一“兴学至速之法”,由郑观应最早提出,迭经胡燏棻、李端棻、康有为等的一再奏请,终

^① 参见 Ruth Hayhoe 所著的 *China's University, 1895—1995: A Century of Cultural Conflict* (Garland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1996) 第一章。

^② 参见胡聘之等《请变通书院章程折》、廖寿丰《请专设书院兼课中西实学折》、张汝梅等《陕西创设格致实学书院折》、康有为《请飭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及《清帝谕各省府厅州县改书院设学校》,均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

于成为最高统治者的谕令，通行全国。其间虽有反复，但秋风日紧，大树飘零已成定局。

科举取士与书院教学，二者既有联系，但更有差别。明清两代，科举制度受到不少有识之士的猛烈抨击；到了19世纪末，更成了中国落后挨打的“罪魁祸首”。可以说，取消科举取士制度，起码在学界，已有长期的理论思考与舆论准备。而废除书院的决策，则是匆促作出的，朝野上下，并没有认真讨论过。当初之所以如此决断，主要是为了应急——将原有款项移作兴办学堂之用，以便尽快培养出可以“富国强兵”的“有用之才”。这就出现了一个令后世史家深感困惑的局面：历来习惯迈四方步的中国人，突然间一路小跑，甩掉了沿用千年的书院制度，而且不吭一声。正像教育史家舒新城所抱怨的，“光绪二十四年以后的改革教育论者，并无一人对于书院制度等有详密的攻击或批评”^①。这里的“并无一人”，乃激愤之言。实际上，有过个别的抗争，只不过人单力薄，无济于事。比如，章太炎便对如此“急功近利”的“兴学”，等于怂恿朝廷统揽教育大权、催逼教育全面西化，有相当激烈的批评^②。

单就口号而言，晚清以降，教育改革的倡导者，几乎没有主张“全盘西化”的。康有为坚持将“上法三代”放在“旁采泰西”之前，张百熙也是先“上溯古制”，后才“参考列邦”^③。可这些沟通中西的努力，最后都基本上落空。翻阅晚清及民国的各种学制，除了在“宗旨”部分表达维护传统伦理道德的强烈愿望外，制度建设方面几乎只能“旁采泰西”。原因是，上古学制的准确面目，今人难以把握，更谈不上将其道入晚清的学制创新。北大校长蔡元培另出新招，

① 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第14页，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

② 参见拙作《章太炎与中国私学传统》，《学人》第二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

③ 参见康有为《请飭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和张百熙《进呈学堂章程折》，均见《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

希望以“孔墨教育之精神”，来补充欧美大学体制；清华校长梅贻琦则重提“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①——可这都是20年代以后的事，其时书院已经逐渐隐入历史深处。

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家宁愿纵论缥缈含糊的“三代之学”，而不想涉及近在眼前的书院之利弊得失，可能有不得已的苦衷，比如，不愿意“穿新鞋走老路”，或者担心旧体制因而“藕断丝连”等。可这么一来，传统中国的教育精神，被高悬云端，无法介入本世纪初极富激情与想象力的制度创新。只是在新学制已经完全确立，书院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教育家们方才回过神来，对书院的黯然退场表示极大的遗憾。比如，以提倡新文化著称的胡适便如此大发感慨：

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②

大略与此同时，胡适的好友、同样留美归来的陈衡哲、任鸿隽夫妇联名发表《一个改良大学教育的提议》，特别标举中国的书院精神，希望将其与欧美大学制度相结合：

我们以为当参合中国书院的精神和西方导师的制度，成一种新的学校组织。中国书院的组织，是以人为中心的，往往一个大师以讲学行谊相号召，就有四方学者翕然从风，不但学问上有相当的研究，就是风气上也有无形的转移，如朱文公的白鹿洞，胡安定的湖州，都是一例。但是书院的组织太简单了，现在的时代，不但没有一个人可以博通众学，满足几百千人的希望，而现在求学的方

^① 参见蔡元培《在卜技利中国学生会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四卷第6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和梅贻琦《大学一解》（《清华学报》第13卷1期，1941年4月）。

^② 胡适：《书院制史略》，《东方杂志》第21卷3期，1924年2月。